

第一章 导 论

贫困，严重困扰着人类社会，已成为当前各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普遍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各国居民一直在为摆脱贫困做不懈的努力，许多国际组织、国家政府也制定过一些雄心勃勃的反贫困计划，学者们也不断提出种种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和实践对一些国家缓解贫困和制定反贫困计划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并未使人类彻底摆脱贫困。据世界银行报告，世界上仍有 $1/5$ 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除贫困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5 亿减少到 1997 年的 6000 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30.7% 下降到 7.1%。我国目前有 600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本章就贫困的基本问题如概念、标准和根源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一些介绍和探讨，以求较全面、准确地理解贫困现象，把握贫困的本质，为我国制定反贫困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一 贫困的概念和标准

贫困现象在 18 世纪之前并不引人注目，当时世界各国的生产力水平普遍很低，人们生活水平也很低。当产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后，世界经济增长加快，一些国家或一些地区新兴的产业部门发展起来，一部分人的收入增加，一些家庭由此变得富裕起来，贫富差距拉大，贫困的问题也就开始被人们所重视，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直到 70 年代，当国际组织

和一些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摆脱贫困的实践。结果发现，尽管经济增长较大，但贫困现象不仅没有被消除，贫富差距反而拉大了。由于贫困被公认为是个多元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地域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贫困内涵的认识是不同的，可从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多个视角去分析和理解，这样就很难形成一个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贫困概念。因此，从经济意义上来把握和界定贫困就成为理论研究的主流导向，将贫困的概念专用于物质生活资源的匮乏。

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认为：“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就是因收入低而缺乏生活资料，缺少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仅能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水平，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即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

（一）绝对贫困

人们最早是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贫困问题，有关贫困的定义一般仅限于较狭窄的收入概念和物质生活的维持。在这方面的早期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的西勃海姆和郎特里。他们提出的绝对贫困概念是根据“仅为维持生理效能的最低需要”进行界定的。西勃海姆关于贫困的定义是：“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取得维持仅仅是物质生活所必须的需要，那么，该家庭就处于贫困状态。”其衡量方法是贫困线，即购买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所需的最低收入标准。显然这是直接从消费方面来定义贫困。这里有用的是“起码的必需品”和“其最低的收入水准”。后来人们对贫困的考察加入了生产方面的因素，即认为除了在消费方面人们无法得到衣、食、住等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状况外，在生产方面，人们也缺乏再生产的物质条件，难以维持自身的简单再生产，然而这些定义还是仅仅从经济角度来概括，属于狭义的贫

困。据此可以认为，绝对贫困即为“生存贫困”，是指收入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生产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况。

绝对贫困概念突出了贫困的生理的、自然客观的生存方面的标准，它不受任何外界生活水平变化的影响。但未考虑到特定时间和特定社会的某些情况，未将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事实上，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远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社会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偏好等必然影响到“必需品”的列出及其最低收入预算。另外，绝对贫困的标准将收入不足以维持尽可能简单的膳食、衣物、住房等方面的起码要求的测定忽视了历史与社会的变化，以及人的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需要，而人们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习俗和社会标准的影响和决定，昨天的奢侈品今天可能就成为舒适品，明天就成了必需品。结果是，对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对“必需品的”调整，绝对贫困的标准不能灵活地调整和反映。

（二 相对贫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逐渐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一部分人收入多，一部分人收入少，这种社会各阶层之间或各阶层内部之间的收入差异就是相对贫困。它是指一个个人或者家庭的收入比社会平均收入少到社会认可的一定程度时所处于的那种生活境况。即国民收入总额中所占份额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的那部分人的生活状况。它不是根据低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固定标准来定义贫困，而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根据社会收入的比较或差距来定义贫困。它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均引起的。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穷人是参照社会其他人来确认的：即根据其本人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比较收入差异关系来确定的；二是它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不平等引起的；三是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标准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四是它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国外通常把 5% 的低收入者或者把低于平均收入水平 $1/2$ 或 $1/3$

的人作为穷人。世界银行曾认为，收入只有社会平均收入 $1/3$ 的社会成员便视为相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指经济意义的差别，一些学者还认为包括心理的感受。M·吉利斯等认为，“穷人指的是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但又感到被剥夺了与社会中另一部分人同享欢乐权利的人。”这些人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并且随着教育和通讯的发展，会越来越多地了解城市的生活，甚至了解到富裕国家的现代生活，随着参照物体的扩展，他们所感受的失落感会越来越强烈起来，心理上的相对贫困也就显得越来越严重。

采用相对贫困的益处，在于可以避免使用绝对贫困概念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它把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和质量标准视为历史的、可以调整的；同时，人的需要不仅限于物质需要，而且也包括文化精神的需要。这就将贫困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纳入研究之中，使之更切合实际。因此，相对贫困本质上就和社会不平等、穷人环境质量的下降以及引起的精神痛苦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增强了相对贫困内涵的丰富性。

无论从心理的失落感来判断贫困是否过于抽象，但仅从经济的收入为标准肯定是片面的。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包括社会、文化、心理等需要。因此，人们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范围内考察贫困问题，并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还指文化生活的匮乏以及身心健康不良等状况。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贫困也包括权力和地位等政治因素，如詹姆·肯凯德说：“贫困不仅仅是指收入分配的最低层，而且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低下，无力控制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对相对贫困概念内涵的拓宽作出深入分析的是英国的伯桑德。他用“社会剥夺”的言辞对相对贫困概念的拓宽部分作出了规范。他认为“剥夺”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不平等的诸方面。收入不是造成贫困生活的唯一因素，仅有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可以有效地改变穷人的生活，在不同的个人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的贫困问题，除了个体意义上的福利消费之外，还应包括人们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及其所享有的社会福利消费水

平，包括住房与当地环境、就业与工作保障、安全与社会关系、生命与财产安全、知识与教育机会、闲暇、政治资本等等，这些都不是收入即经济资源所能替代的内容。因此，有的穷人缺的不是钱，而是这些条件、机会等社会福利资源，而这些可能是穷人被剥夺的结果，贫困是竞争机会不均等导致的结果。包括竞争机会不均等的精神贫困和收入结果不均等的结果贫困。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是从贫困的程度角度划分的，相对贫困是一个社会道德范畴，属于社会公平的主题，它没有一个稳定的、具体的标准。绝对贫困则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标准。世界上目前处于绝对贫困的人口大约有 10 亿左右，占总人口的 $1/5$ ，它主要集中在南非、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主要是相对贫困问题。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两个互相联系的概念。因为绝对贫困包括在相对贫困之中，并且从时空讲，绝对贫困最终也是一个变量。

综上所述，狭义贫困仅从经济意义上来界定，以收入水平为标准，这可能造成片面性。并不是收入水平越高，就说明人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各方面需求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贫困与否，不仅要看生活水平的高低，更要看生活质量的好坏。生活质量不是经济收入就能代表了，它包括人的多种需求，如生理上的物质需求，社会上的安全与保障需求，心理上的尊重需求，精神上的享受需求，文化上的发展需求等等。因此，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无力控制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的状况。它既是一个绝对的量，又是一个相对的量，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静态与动态二者之间的综合现象。要全面了解和研究贫困问题，应将两者相结合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合适。

除上述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外，由于所采用的标准不同，我国学术界对贫困还有以下几种主要分类：

康晓光根据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把贫困分为制度性贫困、区

域性贫困和阶层性贫困。由社会制度（如政治权利分配制度、就业制度等）决定的生活资源的不同社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某些社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这种贫困是制度安排与变迁的制度性贫困；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而引发的贫困称为区域性贫困；在相同的制度背景和区域条件下，由于自身素质较差（文化程度不同、劳动力少、缺少社会公共关系）而处于贫困状态即为阶层性贫困。

吴宝国则从贫困的成因出发把贫困归结为两种类型：资源式条件制约型贫困和能力约束型贫困。前者指由资金、土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它通常表现为区域性贫困；后者则主要指由贫困人口或贫困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缺乏正常的体力、智力和必要的专业技能所引起的贫困，它表现为个体贫困。资源制约型贫困可再分为边际土地型的贫困和资源结构不合理的贫困，前者指人类的生存条件绝对恶劣，后者指各生产要素搭配不合理；能力约束型贫困又分为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贫困和缺乏专业技能引发的贫困。

另外，还有人根据贫困持续时间的长短把贫困分为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根据贫困的定义涉及的范围把它分为广义贫困与狭义贫困。

（三）衡量贫困的标准

由于对贫困概念的理解不同，或者由于研究角度不同，用以衡量贫困标准的指标很多，但一般按以下几个标准来衡量。

1. 贫困线标准。收入与生活质量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以人均收入为标准来衡量贫困是很流行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通常以人均收入水平为标准划定一个贫困线，人均收入水平处于贫困线之下为贫困人口，贫困人口的比例则表明一国或地区的贫困范围，贫困标准由最初依据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演变到依据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这个标准是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即最小需求和收入。最小需求反映的是维持基本生活要

求所需的社会公认的最低福利水平；收入是反映为维持基本生理要求所使用的资源的最小金额。影响到这两个基本要素的因素有：时间跨度的选择，测量单位和不同区域，以及价格因素等。具体标准量值根据以下标准进行综合判断：

(1)人均 GNP 及其增长率为 300 美元和 2%。这是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核心指标。

(2) 非农产业产值占 GNP 的比重为 65%。

(3)乡村通电、通电话、通公共交通、通自来水的四通综合比率为 75%。

(4) 自然缺陷指数为 2。其中水土流失比例 50%以上；旱地面积比例 50%以上；专门气象灾害发生率 50% 以上；地理位置偏远，距离中心城市 150 公里以上。以上四项，每一项满值（50%以上）记 1，否则记 0。

(5)人均年纯收入及其增长率为 600 元和 2%。

(6) 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80 元。

(7) 人均日三大营养摄取量：热量 2500 千卡，蛋白质 60 克 脂肪 50 克。

(8) 人均精神文化消费支出比例为 5%。

(9) 恩格尔系数为 55%。

(10) 年人均肉类消费量 5 公斤。

(11) 人均储蓄存款余额 100 元。

(12) 人均家庭财产占有额为 1400 元。

(13) 人口自然增长率 2% 以上。

(14) 平均预期寿命 65 周岁。

(15) 劳动力接受正规教育年数为 6。

由于贫困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贫困的收入标准主要取决于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因而各国的贫困线也很不一致。以上贫困线标准量值是根据国际组织的标准和我国农村贫困的实际，分别测出贫困标准的各种量值，在

实践中要根据各地实际作综合的理解和判断。

2. 测量贫困程度的方法。单项标准难以反映贫困的全面状况，一般用综合指标来衡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综合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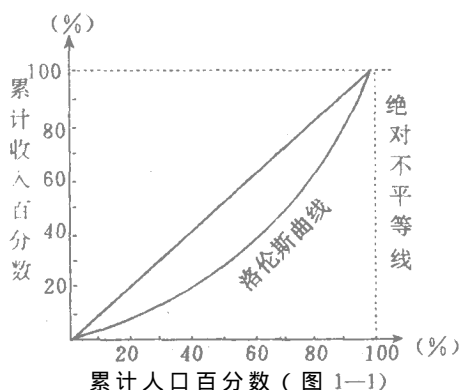
(1) 贫困发生率。它是指根据城乡收入分配数据，计算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的比例。这种方法能够显示贫困人口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变动趋势而成为监控扶贫成效的基本方式之一。有助于明确扶贫的区域重点和急需帮助的贫困阶层。

(2) 贫困缺口率。它是指所有穷人的收入与规定的贫困线 π 之间的总差额与达到贫困线收入的总和之比。主要用它来测定穷人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程度。

(3) 洛伦斯曲线和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的收入分配是否平等的状况，使用最普通的是对收入分配离散程度进行度量的洛伦斯曲线和基尼系数。

为了研究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的状况，洛伦斯按收入水平的高低把社会成员分成 10 个等级，计算每个等级的收入在全社会总收入中的百分数，然后把累计人口百分数与累计收入百分数进行统计，并绘制成图 1—1 所示

在图 1—1 中，45° 对角线是绝对平等线，表示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得到百分之二十的收入，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得到百分之四十的收入，人口百分数与收入的百分数相等，所以上线被称为绝对平等线。绝对不平等线是反映百分之一的人得到了百分之百的收入。



绝对平等线与绝对不平等线只是一种假设，现实中这种曲线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绝对平等线与绝对不平等线之间的曲线就是根据统计所画的洛伦斯曲线，它是由累计百分数所形成的点平滑地连接起来所形成的。

洛伦斯曲线越是接近于绝对平等线，则表示分配是平等；越是接近于绝对不平等，则表示分配越是不均等。此外，由洛伦斯曲线还可看出收入在各级人口中的分配情况。

基尼系数，经济学家基尼在洛伦斯曲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确定收入分配状况的系数，这就是基尼系数。

$$\text{基尼系数} = \frac{\text{绝对平等线与洛伦斯曲线所夹面积}}{\text{绝对平等线与绝对不平等线所夹面积}}$$

基尼系数介于 0 和 1 之间，它越接近 0，则表示分配越均等；越接近 1，则表示分配越不均等。

洛伦斯曲线和基尼系数是经济研究的一种工具。它对于研究和比较某个国家或地区不同时期的收入分配情况，对于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期的分配情况，都有一定的意义。

3. 衡量经济状况的标准。这一标准是调查各种家庭获得资源的机会。最常见的是以下几个福利指标。

(1) 收入指标。包括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

(2) 消费指标。一般以食品消费为内容并分别在家庭或人均收入两个方面所占的比例。

(3) 食品比率。指家庭预算中食品支出所占的比重。一般用恩格尔系数来表示，即食品支出在家庭预算总支出中所占的比率。恩格尔系数越大（70% 以上），则表示该家庭越穷；该系数越小（30% 以下）则表示越富。

(4) 热量指标。该指标将食品消费数据反映为热量的摄入。如 1979 年世界银行提出的贫困的国际营养标准是每人每天摄入 2250 卡，如果低于这个标准，人们从事最低限度的必要的活动能

力就会受到损害。

(5)基本需要。这是测定家庭福利的综合性福利标准。包括直接测定家庭的食物、衣物、医疗、教育和其它方面的最低满足程度。

(6)综合指标法。它由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的英利斯先生设计的一套由三个容易获得资料的反映人类不同基本要求的指标组成的“实物生活质量指数”。它由 3 个基本指标组成：一国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公式如下：

$$PQLI(\text{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 \frac{(\text{预期寿命} + \text{婴儿死亡率} + \text{识字率})}{3}$$

其中婴儿死亡率是指每千个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识字率是指 15 岁以上人口中识字的百分比。计算后每个指标都被赋予 0~100 的比值，以最好和最坏的情况分别作为两个极端，然后取三个指标加权的平均数。该指标既方便又全面，运用这一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测算，得出的结果比较符合实际，但其中没有收入指标，没有反映出物质贫困这个基本特征。

二 贫困的根源

关于贫困产生根源的理论，目前国际国内有多种观点。由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不同，贫困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存在很大差异，这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理由，但又有其局限性，掌握这些学说，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进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

(一) 自然环境论

贫困地区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造成贫困的重要根源。众所周知，地形、气候、土壤、植被、水文、水土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的客观自然因素。美国经济学家 M·P·托达罗写道：“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位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而历史事实是，现代经济增长一切成功的范例几乎都发生在温带国家。这样一种分

歧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巧合，它必然与不同的气候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某些特殊困难有关”。这种观点认为，贫困国家绝大部分集中在热带而当地的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南北纬 30° 之间，与温带相比，热带降雨多，暴雨频率高，很容易发生洪水，摧毁道路、桥梁和其他建筑物，导致水土流失，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极高的温度和湿度，引起土壤中腐殖质分解快，有机质易流失而减少，土壤结构恶化，保持水分的能力也严重下降，形成许多干旱和沙漠地区。同时，又促使有碍农作物生长的杂草、虫害、病害迅速滋生繁殖使农作物减产，使牲畜的健康恶化。贫困与降雨量在地图上居然得到很巧的吻合，在世界地图与降雨量图上，贫困国家占据了几乎所有涂着深蓝色、紫色和深褐色的地区，即年均降雨量在 1000 毫米以上和年降雨量在 250 毫米以下的地区，不是被浇得透湿，就是被烤得冒烟。倾盆大雨冲走了大量肥沃的表土，造成破坏性极大的水土流失，使土地变得贫瘠；久旱无雨又使土地干裂、沙化。另据在欧洲和美国进行的研究，当气温上升到 35.0℃ 时，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会下降一半多。极高的温度和湿度不仅使劳动者感到不适，而且还有损于他们的健康状况，造成劳动者营养不良、体质下降，从而压抑了他们的奋发精神，使他们不愿参加紧张劳累的体力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劳动效率普遍下降。由于自然环境严重恶化，使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除此之外，贫困还大多发生在高寒荒漠的高原、缺土少水的山地，以及盐碱地带、戈壁草滩等处。贫困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如我国的贫困地区就大多处于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由于自然的历史演变，加之贫困地区多是老、少、边、山区，轻视水土保持，毁林毁草种粮，造成森林草被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

自然环境决定论在解释一时一区的贫困实质时，的确有一定意义。但是有些现象是例外的。如在自然环境不良的地区仍有发展较快，贫困现象改变迅速的实例；自然环境恶劣不等于缺乏有经

济价值的资源的开发；不是所有地处热带的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利于农业开发，如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些成员指出，饥饿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现象，是人用其收入和财富购买食物能力的下降，是人为的因素，只有建立稳定的农业系统，改变经济规则才能解决饥荒。

（二）贫困不平理论

1. 资本短缺论。经济学家认为贫困是因为缺乏资本。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对此作了充分的解释。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若干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并列造成的，其中心环节是资本形成不足。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存在着恶性循环的过程，一是在供给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人均收入过低，人们的绝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而很少用于储蓄，导致储蓄水平低，而低下的储蓄能力又引起资本的投资形成不足，其结果是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都难以提高，最后经济增长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造成人均收入很低。如此循环，形成了“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量——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二是从需求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人均收入低，这意味着消费水平和购买力低，市场容量狭小，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低产出和低收入水平形成了“低收入——低购买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正是上述这两个循环相互联结、相互作用和制约，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在封闭条件下长期难以突破的贫困陷阱。这在我国也是较严重的问题。在贫困地区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始终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资本积累后实质性的生产投入并不大，因而贫困的状况长期无法改观。但这种观点也有其缺陷。如在我国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贫困地区的储蓄增长有时快于发达地区，储蓄资本大量从西部流向沿海。

2. 资源贫乏说。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片面采取“西化”

的发展模式是贫困的根源所在。从 60 年代起，贫困国家普遍把资本、资源集中在以市场为依据的工业化方面，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从而加剧了贫困国家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构成了农村持续贫困的直接原因。农业资源短缺是绝大多数贫困国家农村贫困的共同原因，中国也如此。但是资源贫乏，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国际上无什么资源或资源稀少的国家依靠发展劳动力输出、转口贸易、委托加工、技术开发等摆脱贫困者很多。就我国而论这样的事例也不少，如苏南地区、温州地区、珠江三角洲等等，过去同样贫困，也没有什么资源，但依靠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脱贫致富了。因此，资源贫困不具有绝对意义。

3. 极不便利的交通运输、通讯条件。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在社会基础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物质、信息交换活动不可缺少的媒介。交通、通讯的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它束缚着整个国家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贫困地区，缺乏最起码的交通和通讯供给设施，运输路线密度小，许多生产、生活区之间至今无公路沟通，彼此间的货物往来仍靠人挑畜拉。所通公路也普遍质量差，技术等级标准低，造成车辆远载能力差。贫困地区交通、通讯条件的落后 阻碍了其物质、信息交流 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从而制约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4. 政府的责任。在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地区，政府对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政府没有提供脱贫的环境和机会。这方面的两个问题是：一是一些极端贫困的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管理的历史，不具有管理国家的能力；二是具有自我统治悠久历史的国家，由于各种具体原因，难以作出使经济发展起飞所需要的抉择。我国在建国后的 40 多年中，国家的一些行政措施对贫困地区的贫困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比如我国曾长期采取的救济金与救济物质的平均分配政策，作为一种救济的“输血型”对策，不仅抑制了脱贫力度势差的缩小，而且也导致了等待国

家救济，不求变革的思想。

（三）主体不发育论。

有些学者认为，主体的不发育，即劳动者的素质差，是贫困的根本原因。包括人口素质、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等。

1. 人口素质论。人口素质论主要从人口学角度解释贫困的产生。人口因素对贫困问题发生的影响主要在于人口的迅速增长给土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土地严重超载，提供出来的食品分配到每个村民手中越来越少。马尔萨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认为，从长期来看，食物供应是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按几何级数增长，人口增殖能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能力是无限地较为扩大，食物供应增长不会超过人口增长。贫穷，是这个法则绝对必然的结果，英国的济贫法是供养平民以创造平民，只有通过积极抑制或预防抑制来减少人口，才能使人口与生活资料达到均衡，避免贫困的过度发生。马尔萨斯对贫困的解释既包括了人口数量积累贫困，也包括了人口素质积累贫困的双重意思。在其后的科学研究成果中，对人口与贫困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论述：

（1）人口数量论者认为，世界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了对粮食等生活资料需求过旺，由于生活资料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就造成贫困。在生产工具落后，土地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贫困家庭只有通过增加人口从而增加劳动收入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形成贫困循环机制。托达罗认为：“第三世界人口的规模，密度与增长，构成了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在欧洲和北美州的各国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未超过 2‰ 相反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以高于 2.5‰ 的年增长率增加。

（2）人口失控论者认为，贫困不仅造成人口过快增长，而且造成人口素质低下，人口素质提高迟缓，以及社会负担加重。据调查，现在全世界尤其是在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贫困突出的地区，

存在近亲结婚、地方病、流行病等问题。这就产生出人口素质低下、智力开发困难等制约反贫困的现实障碍。另一方面,贫困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也很高,1987 年贫困国家的生育率平均高达 43.78%。发达国家为 15.92%。

(3)人口民族论者认为,贫困与民族性有关系,贫困经常发生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少数民族或部落中间。如在我国 18 个贫困地区中,有 12 个是少数民族地区,涉及全国五大民族自治区,24 个民族自治州,44 个民族自治县。在全国的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 90% 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位于贫困地区。到 1995 年底这些县还有 1100—1200 万人口未解决温饱,约为少数民族县农村人口的 40%。而在这些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有 70% 是少数民族。再如美国的印地安人和东南亚山区的部落民族等。

2. 文化素质论。许多社会学家指出,虽然贫困表现了一种经济条件,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著名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说。他从四个层次对“贫困文化”对穷人的负面效应作了说明:一是从全社会角度看,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该种文化或该种文化的体现者穷人,脱离了社会生活的主流。他们不能与广大的社会融为一体,不能参加到广泛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机构中来,分享不到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处于一种自我封闭或孤立的境地,他们通常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这更加剧了他们贫困的状况。这种文化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穷人对自己低下地位的反应,即穷人由于意识到按照社会上所推崇的标准去获得成功已不可能,于是索性放弃此种努力而信奉一种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并将这种信念传递给下一代。二是从社区的层次上看,这主要体现为一种贫民窟的特殊文化现象。贫民窟内居住拥挤,条件差,然而这里租金低。生活水平下的家庭便聚集在一起。这里的家庭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交互影响,加速了贫困文化的发展。人们长期在此居住便形成

了贫民窟特有的群体意识和贫民窟特有的社区归属感的形式。三是从家庭层次看，贫困文化体现在特定的家庭关系、结构方面。贫困家庭由于负担不起结婚费用，未婚同居的比例较高。在妇女方面，由于感到男子的经济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因而也不愿与之建立稳定的家庭关系。此种家庭结构松散，家中常有暴力行为发生。在很多穷人家庭，父亲出走后只好由母亲充当主要劳动力，这更使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儿童中途辍学。居住的拥挤使家庭成员很少有隐私权，孩子们较早地接触到“性”，因而较早发生性关系，未婚现象和私生现象随之发生。四是从个人层次看，作为贫困文化典型代表的个人通常知识贫乏、眼界窄小，只关心眼前利益和个人的事情，没有社会感。他们的生活无计划，有强烈的及时行乐倾向，很难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舍弃眼前利益，缺乏进取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依赖或懒惰心理。相信“宿命论”，有自暴自弃或自毁的倾向。

我国有关人口素质论的研究者认为，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贫困地区的居民们缺乏进取精神。人的素质包括人的先天禀赋，但后天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环境对人的素质往往起决定作用，人的素质导致贫困，但人的素质又是贫困造成的结果，一个贫困的社会环境，经济停滞，教育落后，不可造就高素质的劳动力，低素质和贫困互为因果。

3. 科技落后说。科技落后论认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性和传统性。虽然贫困经济中也有技术的不断改进，但这种改进不仅是缓慢的，而且多属传统经验的量的积累，难以产生质的飞跃。许多研究者指出：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地理环境上封闭的贫困落后地区，不仅其内部的技术创造发明是稀少的，也很少有外界的新技术输入。因此，有学者把这种主要依靠传统经验积累起来的技术称为传统技术或传统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农具、人口和畜力、肥料、种子、耕作制度等。因为生产技术的传统性，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在生产上作了许多努力，但终因没有技术上的

创新，使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性质未发生根本的转变。人们以低下的传统经验技术面向自然，不但不能控制自然，反而受着自然的控制。因为贫困经济实际上是各种品质不变的生产要素处在最佳状态时的经济。人们的知识就是以这种生产要素质量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成长起来，正是这种知识的氛围，在现实中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和引进，由于与外界隔离的生产封闭环境和保守落后的生产习惯，这种知识与其生产生长起来的现存生产要素的质量保持着牢固的均衡。针对贫困经济的低素质的生产要素最佳配置状态中运行的实际，舒尔茨在他的《改造传统农业》中把这种情况描述为“理性小农”，认为传统小农如同在特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于价格反应灵活，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传统农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这就是所谓“贫穷而有效率”的著名命题。他还认为，“理性小农”是难以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结构的，只要增加农户识别及有效使用“较好”技术的知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人力培训），引进现代农业的高质量投入，如良种和新技术，便可望打破传统的内部均衡和停滞条件，可望激发小农的投资和创新活动，从而带来更高产量，改造传统农业，消除贫困。

（四）贫困的社会政治根源

政治学者主要以考察富裕与贫困、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出发，建立社会——政治——经济模型来揭示贫困的根源。他们认为，贫困主要是与高度扭曲的不同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模式有关，特别是与所有权体制、土地租赁关系，资本的拥有和接近信贷与投入供应的程度有关。大众贫困有两个方面：一是消费所要求的货物生产的短缺；二是穷人征用这些货物的购买力不足。这两方面都与所有权模式、需求结构和生产过程有关，只要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产的发展就不会自动地消除贫困。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如下：

1. 社会制度的解释。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